



禪思想探原

柳田聖山著

東山法門之主張

柳田聖山著
東山法門之主張

(續上期)

不過，這裏應該注意的，並不是有關「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或智顥自身的主張；而是，正當智顥依據這部經典，在其四種三昧中先組織其一行三昧時，已有別的述說同樣一行三昧的經典與論書，在屢屢吸引人們的注意了。例如有名的「大乘起信論」這可以說是這個時代最扼要的一部佛教概論書，這書所舉出作為實際修行方法的，正是止觀與念佛二者。特別是，它以為在這止的修行上展開坐禪，至日久而修習純熟時，則轉瞬可入真如三昧，依這三昧而觀那根源的唯一真理（法界一相），而悟到一切諸佛的法身與衆生身的平等性；這特別稱為一行三昧。所謂根源的唯一的東西，正是相應於般若波羅密的一行者；在這「大乘起信論」中，這是指那形而上的一心的作用，這在本質上已異向了。這點是需要注意的。

「大乘起信論」是否印度梵語原文的漢譯，古來已有疑問。而在與此書有密切關係的「占察善惡業報經」中，亦說及同樣的一行三昧；這部經典兼雜了中國的通俗信仰，是極為通俗的經典。這點是需要考慮及的。事實上，當「大乘起信論」介紹到中國來後，智顥的「小止觀」與被認為是慧思作的「大乘止觀法門」等的實踐書，都吸收其主張；就此點看，此書主要是作為止觀與

這裏使人想起我國的道元所提出的「只管打坐」的教法。這不用說，是要把所有實踐與學問體系包含於單純坐禪的一行中。

由綜合到選擇單純的一行

東山法門之主張

這裏達磨教法的人們，最初受到天台止觀的影響，這一點，經過徵諸多數史實，是確定的了。但我們知道，這在內容方面不必是順着天台路數的那種天台止觀的直線的發展。對於被稱為「圓頓」的天台的綜合的教與觀的體系來說，禪宗的實踐旨趣，是較為單純的，是更為直截的。最低限度，中國禪宗的一行三昧的坐禪，不久即脫離智顥所用的「文殊說般若經」，轉到「起信

論」的一行三昧，更轉變到不直說一行三昧的「勝天王般若經」與「金剛般若經」方面去。著名的「六祖壇經」亦說「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所謂直心，較古的「維摩經」已說過，在較近的「起信論」中亦可見到，但在這「壇經」中，這顯然是根源義的形而上的一心之意。

這是上章所述的始自僧肇的中國式的體用論的新展開，是來自「起信論」的強制的本末性立場的再發見；關於這點，我們以後會再考究。這裏應該注意之點是，比較起中國天台佛教是印度佛教的正統發展這一點來說，禪宗的成立，則有強烈的中國思想來面目，而禪宗則更可以說是較此爲甚。在先前所引宗密分別名此兩者爲大乘禪與最上乘禪一點中，實含有這樣的寓意。

現在讓我們本着以上這個意思，先就「楞伽師資記」看看作爲東山法門的創始者而導致達磨系禪宗的自覺形成的第四祖雙峯道信的禪法吧。「楞伽師資記」是要透過「楞伽經」的自覺聖智與獨一靜處等教法來說明初期禪宗在思想上的立足點的一本書。這裏我們暫且不考究有關「楞伽經」的事，但當先知道一點，即這部經典在內容上與「起信論」有密切的關係，兩者都是主要論及根源的一心及其展開的。

一心之展開

「楞伽師資記」道信章表示道信的說法如下：

坐時當覺識心初動。運運流注，隨其來去，皆令知之。以金剛慧微責。猶如草木，無所別知之無知，乃名一切智。此是菩薩一相法門。

道信所說要知道自心最初的動作，源於「起信論」；「起信論」說明究竟覺——意即對生滅心最初的動作作內省——如下：

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

在「起信論」中，究竟覺被視爲達到如來或佛之位的人所有的智慧，可以說是那完成了十階段的修行的菩薩，通過在最後才到達的如金剛那樣堅固的安定，而獲得的東西。這究竟覺另外又

叫作真如三昧，或金剛三昧，一行三昧，正是宗密所謂最上乘禪之意。道信的坐禪，確已具有這樣的根源性的覺悟的性格，而最低限度，後來由神秀（六〇六？——七〇六）開始的北宗禪的哲學，即基於這樣的構想而展開。

這樣，初期禪宗人士在單純而具體的實踐中所寄予的興趣，即由天台智顥所會使用過的「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移至「楞伽經」與「起信論」的一心說方面，而逐漸深入到那根源的唯一者中去。而且，由道信弘忍他們創東山法門以至神秀及其弟子們形成北宗禪這段時期，華嚴哲學正以長安爲中心而繁興起來；這種興趣亦與華嚴哲學結合在一起。

在先前所引宗密對最上乘禪的說明中，有很多華嚴宗的用語；最上乘禪之被視爲層次上高於天台止觀的東西，原與這點有關係。實際上，在這期間，以達磨爲初祖的中國禪宗，已超越單純的坐禪與瞑想之域，而把全部的關心，流注到對那獨一的形而上的一心的探究方面去。例如，「二入四行」的教法，傳述初期達磨的樸素瞑想法，而借佛說的權威來證實這教法的「金剛三昧經」，可以說是一本倣「大乘起信論」而寫成的最上乘禪的經典；而被視爲北宗禪代表的神秀，則作出龐大的「華嚴經」的注釋及綱要書。

又在敦煌發現的神秀的「大乘無生方便門」，即要透過由「起信論」至「華嚴經」的合共五種大乘經典來試圖組織形而上的一心的體系。關於這書，我們在後面會有更詳細的考究。這裏我們要留意一下他的另外一本稱爲「觀心論」的綱要書，他在這書中簡潔地說明這種一心的實踐。這書的部份語句，中唐慧琳（七三七——八二〇）在其「一切經音義」續編中會有解說，而與印度以來的三藏書籍並列，受到很大的重視。這表示，他們的中國禪宗已爲傳統的上層知識分子所接受；不久華嚴方面有澄觀（七八——八三九）與宗密等人出，對這派的禪予以特別的注意。

北宗禪之主張

達磨系的禪宗，雖是同樣一心的內省，但却不是玄奘與慈恩的唯識說；它之與華嚴哲學相連，那大抵是由於兩者對中國式的

獨一的形而上的絕對問題，都有特別的關心之故。現在，我們要透過「觀心論」一書，看看神秀的主張的特色，以作為考究這些點的一個實例。（譯者按：以下語體文譯）

當偉大的求道者致力於探究深遠的般若波羅蜜時，他首先知道，構成這個世界的四種物質與五種精神要素，本來全都是空的，不具有實體性。然後，他對自己的內心，作這樣的省察——。心的活動，有兩種不同的領域。這即是清淨心與染污心。所謂清淨心，即沒有煩惱的如其本來面目的心；染污心即為無明所擾亂的煩惱的心。這兩種心皆與生俱來，依緣而和合，互相牽制對方；清淨心常修善因，染污心則常起惡業。此中，有覺悟到本來的真心的人，不為煩惱所染污，而被稱為聖人。他漸次遠離諸苦之因，獲得涅槃之樂。與之相反的，與染污相結合而造惡業的人，則為其執著所支配而被稱為凡人。久而沉沒於三界，領受諸苦。何以會這樣呢？那是由於染污心掩蓋了其真心之故。『十地經』云：「衆生各自身體中都有金剛般的不變的佛性。恰如日輪那樣，它能自己發出光明，完全圓滿，廣大無限。不過，那構成所謂五陰的五種精神要素，却如黑雲那樣把它覆蓋着，致使不能完全發出其光輝，——宛如瓶中的燈火不能照亮外部那樣。」又『涅槃經』說：「衆生皆有佛性，只為無明所覆而不能得自由耳。」所謂佛性，大體是覺悟本來的心之意。人倘能自覺，則生命中所具有的智慧自能發出明亮的光輝；而能遠離覆障物時，即是解脫。由此可知，在所有的善中，只有對自己自覺，才是根本的善。倘能牢牢地實現根本的覺悟，則所有功德之樹與涅槃之果實，自得成就。

（未完待續）

（上接第33頁 一代哲人已成終古）

（唐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於香江慈航淨苑，曾披閱筆者自印度携回之泉聲散稿後，促編印成書。）此外，唐先生遺著中「說中國民族之花果飄零」這個題目讀之令人酸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

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是否因為唐先生多年久居殖民地，當然會同一般流散異鄉之人有思國懷鄉之感。同時處此風雨飄搖的國家文命之時代，於是感到「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但雖然處此一大悲劇之時代，中華文化的子孫仍然有其發展之一面。談書附錄中：「中國文化與世界」說：對中國文化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仍認為極有希望的；「至於純從中國人之人生道德倫理之實踐方面說，則此中亦明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在中國人生道德思想中，大家無論如何不能忽視。」（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所以中國文化仍然植根於倫理道德，和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可以克服許多艱難並養成堅忍毅力的個性，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歷經千錘百鍊仍然能站得穩，所以中國要用梅花作國花之表徵，希望國人處此艱難時代，仍然開放芬芳花朵。中國禪師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是否唐先生所說「花果飄零」亦含有這種暗示。（雖然也有人不同意該書中的說法）唐先生許多遺著中，這二本前後二十幾年的著作，筆者時常也介紹年青人閱讀，讓後一代的華夏子孫也能領略到真正讀書人對中國文化之深入了解，也正式了解儒佛文化之如何相融，使中國文化發展得光輝燦爛，使人生更有依止，對人生許多問題均能處理得游刃有餘，這是值得我們推崇的人生至理。

香港嶼山北岸風景殊勝（嶼山乃香港佛教聖地，筆者早年置雲光園地），唐先生的門人趙潛、張世彬先生等常到該處旅遊，該地蒼松遍植，綠翠青山，山明水秀，環境清淨；唐先生為關懷後學，培養深造，常於見面時提及甚盼能在嶼山雲光園地建設一所提供予青年學者作度假潛深研究之所。（唐先生逝世前數週，趙潛先生來函，謂唐師及同學們有意在雲光園建設房宇，作為山中安靜之處，以供研究之用，豈料信未詳覆，而唐先生已作古）。由此可見唐先生對後輩培養之用心。唐先生獻身教界，桃李遍天下，能繼承乃師之思想後起有人，唐先生亦當含笑瞑目！

丁巳去歲新正，便開始寫哀悼道安法師的紀念文；今年正月寫唐先生之悼文，接着又要撰寫哀悼東初老法師的紀念文。無論超人、哲人，在肉眼的世法中，無法逃出生老病死。詩人便慨歎：流水東馳去不還，江干悄立目送流水！